

近代汉语三音词发展原因试析

杨爱姣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杨爱姣(1974-), 女, 湖北洪湖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词汇语法研究。

[摘要] 汉语里的三音节词, 中古开始产生, 元以后有了巨大的发展, 成为近代汉语口语化特别鲜明的标志之一。三音词大量涌现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发展、语音的简化、语体的转化、造词法的完善四个方面。

[关键词] 近代汉语; 三音词; 发展原因; 造词法

[中图分类号] H 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4-0568-04

对词汇发展史上的重大规律——双音词化, 历代学者用力甚勤, 著述颇丰。然而, 对近代汉语三音化现象, 则着力甚微, 拓展不足。事实上, “汉语里的三音节词, 中古开始产生, 元以后有了巨大的发展”^[1](第630页), 它成为近代汉语口语化特别鲜明的标志之一。而且, 它还“大大增加了汉语词汇的容量和构词方式的灵活性。……为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广阔道路”^[1](第637页), 在现代汉语里更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三音词敏感反映出近代社会物质系统、行为系统及精神系统的剧烈变动与更新, 有力地揭示了近代汉语语音、义矛盾斗争通过词才得以解决的现象, 并雄辩地证明了近代汉语口语体逐步替代文言书面体的弃雅从俗的事实, 预示着造词法的日益成熟与完善。本文拟从近代社会的发展、语音的简化、语体的转化、造词法的完善四方面来探讨三音词的发展原因。

一、社会的发展

词汇是语言中最敏感的构成部分, “凡是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的东西, 不论是新制度, 新体制, 新措施, 新思潮, 新物质, 新观念, 新工具, 总之, 这新的东西千方百计要在语言中表现出来”^[2](第207页)。宋、元、明、清四代, 尤其是清代后期, 我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导致反映社会现实最直接、最迅速的汉语词汇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第一, 从物质生产领域来看, 明、清正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胎儿蠕动形成之时, 由于海外交通频繁, 城市逐渐兴起, 商业资本积累, 生产方式亦由过去的粗放数量型转向集约质量

型, 分工协作日益精细, 产品名目繁多。而“语言反映生产中的改变是直接的, 是立刻发生的, 而不等候基础中的改变。”^[3](第27页) 比如“博士”, 上古本学官名。《史记·循吏列传》: “公仪休者, 鲁博士也, 以高第为相鲁。”从唐代开始, 又指对具有专门技艺或专门从事某种职业的人的尊称。《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云: “正是, 春为花博士, 酒为色媒人。”元·马致远《岳阳楼》第五折: “倒也躲是非忘宠辱无牵挂, 不强似你在人我场中, 把个茶博士终朝淘漉。”在双音词“博士”前增加新的焦点信息“花”、“茶”, 分别构成两个三音词, 指代不同的职业或行业, 并可据此类推出“酒博士”、“烟博士”等职业名称。再者“从社会交际的需要来说, 由于物产不断增多, 技艺日臻精良, 常需对原有的一个词加以修饰限定, 以标明由它代表的同一事物分化、繁衍出一批新事物”^[4](第492页)。如以“铜”为中心的语素的三音词有“三水铜”、“四水铜”、“自然铜”、“蒙山铜”; 以“金”为中心语素的三音词有“马蹄金”、“橄榄金”、“瓜子金”、“面沙金”、“豆粒金”等; 有关“钱”的三音词有“草鞋钱”、“信赏钱”、“冤苦钱”、“拜见钱”、“脂粉钱”、“脚步钱”、“口含钱”、“日头钱”、“坐舱钱”等; “匠”的三音词有“泥水匠”、“针笔匠”、“文笔匠”、“谎皮匠”等;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很多新词汇, 它们不改变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语汇, 但是它们却丰富了人类的语汇库。”^[2](第207页) 晚清时代, 受西方物质文明的影响, 国内兴起洋务运动等系列改革, “洋务局”、“资本家”、“印刷机”、“纺织机”、“蒸机机”、“实验室”等三音新名词应运而生。“随着词汇的进一步发展, 需要表达的新概念进一步增加。利用现有双音词

作基础构成新词也就成为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的自然。”^[1](第637页)例如,有了“资本”、“印刷”、“纺织”、“实验”等双音词,拥有资本的人称为“资本家”,用来印刷或纺织的机器叫做“印刷机”或“纺织机”,用来做实验的专门场所称之为“实验室”,这样通过拓宽词形将新的复杂概念表达得十分明确。

第二,物质系统日新月异的发展,促使与之密切相关的精神文化系统,包括物质系统民俗、行为系统民俗及信仰民俗发生相应演变与更新,人们的思维方式亦从低级到高级,由粗疏向精密发展。“单音词在语言交际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为具体词义满足不了人们的认识日益概括、抽象的需要;宽泛的词义满足不了语言交际日益精密、准确的需要。”^[5](第58页)双音词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种矛盾,但有限的词形结构依然满足不了与时俱进的词汇增长的需要。于是,利用单音词与双音词为构词原料复合而成的三音词,以其明确性、狭义化的语义优势满足了这种需求。“从词义上看,一般来说单语素构成的词其词义最为概括;双语素的词义其范围就窄些,意义也具体些;三语素的意义应当更具体,更个性化。”^[6](第106页)例如,有关典章制度的“警迹人”、“一条鞭”、“五代史”、“五圣堂”、“军令状”、“番天印”、“殿头官”等;有关民间习俗的“火把节”、“照虚耗”、“随身灯”、“烈纸钱”、“长明灯”、“长休饭”、“守宫砂”、“永别酒”、“长命灯”等;有关宗教迷信方面的“儿女债”、“九转丹”、“八阳经”、“三尸神”、“天报疮”、“玉皇殿”、“现世报”、“夜叉婆”、“闲冤家”等;有关衣食住行习俗的,如“汤饼会”、“红椅子”、“围脖子”、“油木梳”、“闹米汤”、“苦丁茶”、“八仙桌”、“人力车”、“乡瓜子”、“三头鞋”等;有关称谓民俗的,如“亲家公”、“亲家母”、“小娘子”、“店小二”、“老咬虫”、“小老婆”、“小么儿”、“小郎君”等。

语言从本质上讲是社会性的,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词汇中,尤其是词的音节数目上。“春秋战国时大量增加的新词在形式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单音节为主……古汉语词汇发展到唐宋时代,又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因为唐宋以后,大量增加的新词在形式上是以双音节为主”^[7](第63页),同时,三音词有所发展,元、明、清时代三音词剧增,“就现代汉语的情况来看,合成词不仅在数量上已占了优势,而且在合成词中,除大多数是双音节形式外,三音节形式的数量也相当可观”^[8](第165页)。

二、语音的简化

语言的形式(声音)和内容(意义)之间永远存在矛盾斗争。语言的形式与内容自身又是经常变化的,各组成部分内部的调整,造成局部系统的变化。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连锁反应与调整,促使整个语言系统发生变化。语言各部分之间的平衡——不平衡,相对平衡的不断被打破和新的平衡的不断建立就是语言发展的基本形式。近代汉语三音词剧增,根本动因来自于语言系统内部语音的巨变。自唐宋以来,“声母从清浊两套变为只有清音一套,韵部从阴、阳、入三种韵,变为只有阴、阳两韵;声调也从唐代的四类八调,即平上去入各依声母清浊而分阴、阳两类,变为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三类四调”^[9](第70页)。声韵调全方位简化使得汉语音节总

量骤减,“从远一点的时间来看,汉语的音节数量减少,导致音系的简化,必须通过词的延长,就是增加单个词的音节数量来补偿”^[10](第272页)。双音词功能负荷增大,成为语音简化的主要的平衡锤,然而双音词词形结构有限,负荷的信息指数有限,同样存在多义、歧义同音等负语言效应,虽独当一面,终究不能孤军奋战,力挽狂澜,三音词应时而生。在毋须另造新词的情况下,它谨慎地突破词形长度,增加焦点信息,克服了双音词面临的词形有限、语音重复、意义宽泛的困窘,以多变的、多层次的组合将有限的词素发挥出无限的生产力、表现力,成为语音简化的另一不可小觑的平衡锤。前文提及,近代社会物质系统、行为系统、精神系统里的新实物、新事项、新理念、新现象层出不穷,词汇量激增,语音量骤减,继续维持词汇的单、双音节体系显得力不从心,汉语词汇向多音节发展已是势在必行,但汉语有抵制多音化的倾向。四音节冗长,就音节而言严重超载,单调呆板,竞争不过音步清晰、词长适中、内涵明确的活泼形式三音节。在近代汉语三音词中,名词占绝对优势,一般是“先有事物或概念,造词主体按照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选择造词材料,再通过对旧事物的修饰或限制来实现对新事物的指称”^[11](第15页)。譬如“亲家”,见于《新唐书·萧嵩传》:“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谒,帝(玄宗)呼为亲家”。后为区分“亲家”性别,在核心词“亲家”后分别加上“公”、“母”作逆序修饰语,构成新词“亲家公”、“亲家母”,与不分性别的笼统称谓“亲家”相比,它们的类别更精细,内涵更明确,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而且不用另造新词。如元·萧德祥《杀狗劝夫》第2折:“老汉罗大户,如今到这鲁家庄上,若见了那亲家母,我自有主意。”明·缺名《黄孝子》第26折:“我是亲家公,怎么做掌礼人?”如果把全国各地方言各自的音节总数作一个统计和对比,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一种方言音节数量越多,单音词越多,譬如粤方言;方言音节数量越少,单音词越少,多音词尤其是三音词越多,比如北方方言。

三、语体的转化

语体变化,实质上包含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是由俗变雅,一是从雅到俗。近代汉语正是处于由雅到俗的语体转型时期。以隋唐五代为限,市民阶层的形成壮大,平民意识的增强和审美情趣的通俗化,促使白话小说的兴盛,在语体上更是弃雅从俗,刻意模仿当时的口语。到了宋代,禅宗高僧、儒学大师的语录《五灯会元》、《朱子语类》等作品及民间说话人的底本“话本”通篇白话,至此,古白话作为一种密切结合口语的书面加工形式,以其完整语言作品的大量出现和更密切结合口语为标志,完全成熟了。此后,元杂剧、戏曲的繁荣彻底改变宋以前正统文学(或称“雅文学”)的主导地位,使通俗文学居于统治地位。明、清小说巩固并发展这一趋势。袁宾先生说:“比较起古代汉语来,近代汉语的文献语言在口语性、时代性和地域性三个方面表现得更为显著。”^[12](第17页)向熹先生亦指出:“大量口语成分涌入文学语言,是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之一。”^[1](第607页)这种弃雅从俗的语体变化,正是语言内部雅俗两种力量斗争和人们在实践中求雅求俗

两种需求斗争的结果,它们共同决定语言尽量贴近现实。单音词、双音词乃至四音词都能容纳俗的口语成分,如“恁”、“瞧”、“恁”、“瞅”、“巴子”、“盖老”、“撩丁”、“牛子”、“缠仗”、“胡柴”、“惫赖”、“黑不溜秋”、“破不留丢”、“八搭麻鞋”、“不当人子”、“脑袋瓜子”、“水老鼠花”等。但单音词随语音的简化而骤减,而且这最小的音义结合体“面对日益扩大,近乎无限的词义内容捉襟见肘”^[5](第 60 页),其含义载量饱和已不堪重负,不能成为口语的主流;双音词与四音词从乐感上符合中华民族追求偶化的审美心理,“偶字易适,奇字难安”,更多负载雅化语言。如汉赋骈辞、唐诗宋词里的双音词“惊鸿”、“秋菊”、“芳泽”、“铅华”、“踟蹰”、“明珠”、“狐疑”、“萧瑟”、“牵牛”、“徘徊”、“罗网”、“苍天”、“荏苒”、“伫立”、“相思”、“离别”、“多情”、“凄清”、“冷落”、“风情”、“憔悴”等;四字格多为具有典雅风格色彩的成语,如“天人合一”、“忠孝节义”、“兰桂齐芳”、“一诺千金”、“夫唱妇和”、“投笔从戎”、“安居乐业”、“海人不倦”、“学而不厌”、“刚正不阿”、“精卫填海”等等。总之,双音词与四字格虽能承受俗语言,但在历代语言实践中更倾向于负荷雅语言。惟有三音词突破汉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与审美倾向,化严整为参差,变稳定为错落,更适合口语交际不拘一格、轻松活泼的语言风格,成为偶化音节造词潮流中的变奏。遍查历代文献资料,不难发现,在古文诗词等雅文学居主导地位的上古、中古时期,三音词数量甚微;其大幅度的增加,恰好发生在通俗文学(或曰市民文学、平民文学)占统治地位的近代,这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内在必然联系。弃雅从俗的语体演变,是三音词产生的外在诱因。我们撷取三音词若干例,对其语体色彩、风格色彩作一个比较分析:

上古	中古	近代
妻	正室	大老婆(大娘子)
妾	偏房	小老婆
孩,小儿, 垂髫	孩童	小干杆(吴语) 小鬼头 小猴子
农	村夫 乡夫 农夫	乡瓜子 乡巴佬
秃	秃顶	骨光骨良 头(吴语)
踪,迹	影踪 形踪	影子花

由此表可作大胆推测:三音词在感情色彩、风格色彩、语体色彩与等值的单音词、双音词迥异,前者更适合口语语体,而后者更适合文言语体。如“大老婆”、“小老婆”、“小鬼头”、“小猴子”、“影子花”都带有明显的亲昵通俗的口语色彩。单音词“妻、妾”、“孩”“秃”、“踪”,双音词“正室”、“偏室”、“孩童”、“秃顶”、“行踪”等则具有中性感情色彩,典雅的风格色彩。还可以看出“子”、“头”等后缀,“大”、“小”等准前缀在三音词中使用频繁,“因为口语总是力图通过添加新的要素而使话易于理解”^[13](第 387 页)。

弃雅从俗的语体变化,还成了近代汉语“ABB”式状态形容词激增的催化剂。“元明时代,这种结构非常能产,具有相当强的构词能力。”^[14](第 45 页)蒋冀骋先生还推测:“这种叠音词多出现在元、明杂剧的唱词里,可能与戏曲的曲调有关。”^[14](第 46 页)元曲、杂剧中出现大量“ABB”摹声词,也可能是戏曲唱腔的拖腔所致,为音节延长之语,使得节奏更和

谐,语音更流畅。“既要保留平稳的优点,又要避免板滞的缺点,较常用的安排是让成对的三音节出现在作品之中。”^[15](第 23 页)例如,“昨夜个喜孜孜灯下相亲傍,今日假惺惺堂上问行藏。”(《东坡梦》第 4 折)“我睡啊黑甜甜倒身如酒醉,忽喽喽酣睡似雷鸣。”(《陈抟高卧》第 1 折)以上均是实词,近代汉语还出现一些三音节虚词。如“终不成”、“终不然”、“尚兀自”、“尚古自”、“只除非”、“只除是”等,较之等义的双音虚词“难道”、“犹自”、“除非”等,前者显得更为亲切顺口。

总之,弃雅从俗的语体演变,是近代汉语三音节激增的诱因,它选择并滋养了三音词这种民俗色彩浓郁的词型。三音词又反作用于通俗文学,将其顺口、顺耳、易记、易唱的形式特色与生动诙谐、轻松明快的语用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造词法的完善

造词法是汉语创造新词的方法,按造词方式可分为原生法与再生法;按造词语料性质又可分为语音造词、语义造词和语法造词、语形造词。也有人称之为复合法与派生法,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讲,近代汉语之前的造词法已相当完善,为三音词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基础,创设了良好的语法环境,使其合法合理,合情合用。

从语音造词来看,上古早已采用这种古老造词方式,以音为表,摹声为名,并且,“古汉语中的摹声词并不限于名词,动作的名称也有摹拟动作时发出的声音而造成,这就是列维——布留尔说的那种‘用摹仿的声音来表示事物的主要性质’”^[7](第 75 页),如《诗经》中大量出现的叠音象声词:“关关雎鸠”(《周南·关雎》)“其鸣喈喈”(《周南·葛覃》)、“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小雅·伐木》)、“呦呦鹿鸣”(《小雅·鹿鸣》)、“卢令令”(《齐风·卢令》)、“习习谷风”(《小雅·谷风》)、“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卫风·硕人》),到了汉赋唐诗宋词中,象声词有所增加,主要用于拟声、描形、摹状等。双音象声词为元曲中大量出现的三音象声词奠定了良好的语义基础,并为其功能变异埋下了伏笔。首先是词义变化,词性也变为形容词。例如,“我喝一喝骨都都海波腾,撼一撼赤力力山岳崩”(元高文秀《黑旋风》第 1 折)中,“都都”、“力力”都已存在于上古或中古的象声词族里,在前分别加一个重音“骨”、“赤”,宛如华尔兹快三舞曲,音步清晰,圆融流畅,且象声词此处已成为一种形容手段,“骨都都”拟海涛翻滚状,“赤力力”摹写山崩地裂状,并非与原始真声一一对应,而是一种变异摹声。

其次,中古的一部分象声词变成了近代状态形容词的后缀。如“沥沥”、“哄哄”、“吼吼”、“乎乎”、“簇簇”、“唧唧”,到了近代变成了三音节的“血沥沥”、“闹哄哄”、“气吼吼”、“气呼呼”、“花簇簇”、“笑唧唧”。

从语义造词法来讲,中古造词主要是将两个单音词根通过加合、融合、附合等复合方式构造新词。例如,联合式复合词“模样”、“躯干”、“包弹”、“撩拨”、“思想”、“研究”、“允许”、“仔细”、“名胜”、“爱护”、“剥削”、“料理”等;附合式复合词,如“榜首”、“科场”、“科名”、“火箭”、“火车”、“脚钱”、“飞车”、“砂糖”等。近代汉语则利用中古语言材料,比照中古造词格

式,造出大量三音词。例如,在上古、中古的重言词前加一个性质形容词,便形成近代“ABB”状态形容词:“绿油油”、“绿幽幽”、“红灼灼”、“明晃晃”、“空荡荡”、“静悄悄”、“黑洞洞”、“碧荡荡”、“赤津津”、“宽绰绰”。还有一些复合名词,如“马蹄金”、“马蹄袖”、“天鹅肉”、“五脏神”、“风月馆”、“风情话”、“水牯牛”、“皮老虎”、“并蒂莲”、“军令状”、“灯油钱”、“地理师”等,均是语义中的修辞造词。

从词缀造词来看,产生于先秦中古汉语的词缀仍很活跃,其中产生于中古汉语的词缀功能不断发展完善。如“老”、“头”、“子”、“儿”在中古进一步完善,功能稳定,性质明确,位置固定,成为严格意义的后缀。同时中古还萌生一些准词缀,如“黑”、“价”、“生”、“来”、“打”、“小”、“家”等。大量词缀和准词缀的涌现为近代汉语三音词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与稳定的构词框架,三音词反过来又通过构词实践与造句实践进一步拓展词缀的语法功能,完善准词缀的语义语用,使之稳步过渡为词缀,依词缀而造的词有:“阿那个”、“柳斗儿”、“沙壳子”、“二婚头”、“老实头”、“歹事头”、“书毒头”等;依准词缀而造的有“好没生”、“每日价”、“成天价”、“暝子里”、“眼下里”、“抵死里”、“大刚来”、“恰又来”、“到大来”、“尚兀自”、“犹兀自”、“小娘子”、“小鬼头”、“小猴子”、“小官人”、“小杵头”等。

[参 考 文 献]

- [1] 向熹. 简明汉语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 陈原. 社会语言学[M]. 北京:学林出版社,1994.

- [3] 高名凯,石安石. 语言学概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程湘清. 宋元明汉语研究[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5] 苏新春. 汉语双音词化的根据和动因[J]. 广州师学院报,1990,(4).
[6] 李庚钧. 三语素合成词说略[J]. 中国语文,1992,(2).
[7] 周光庆. 古汉语词汇学简论[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8] 葛本仪. 论汉语合成词形成的有理性[A]. 词汇学研究[C].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9] 张九林. 试说汉语语音史上的几个“为什么”[J]. 淮北煤师院学报,1991,(4).
[10] 彭泽润,等. 语言文字原理[M]. 长沙:岳麓书社,1995.
[11] 卞成林. 现代汉语三音节复合词结构分析[J]. 汉语学习,1998,(4).
[12] 袁宾. 论近代汉语[J]. 广西大学学报,1987,(1).
[13] 威廉·冯·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4] 蒋冀骋.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15] 文炼. 汉语语句的节律问题[J]. 中国语文,1994,(1).

(责任编辑 何良昊)

The Cause of Formation of Three-Syllabled Terms in Modern Chinese

YANG Ai-jiao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YANG Ai-jiao (1974-), fe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vocabulary and grammar.

Abstract: Originated in Middle Ages, three-syllabled terms attained great development in Yuan Dynasty, and became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symbols of modern Chinese' verblity. This papers which probed into the cause of forma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aspects,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implication of the phonetics, change of style, consummation of term-making methods.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three-syllabled term; cause of development; term-making method